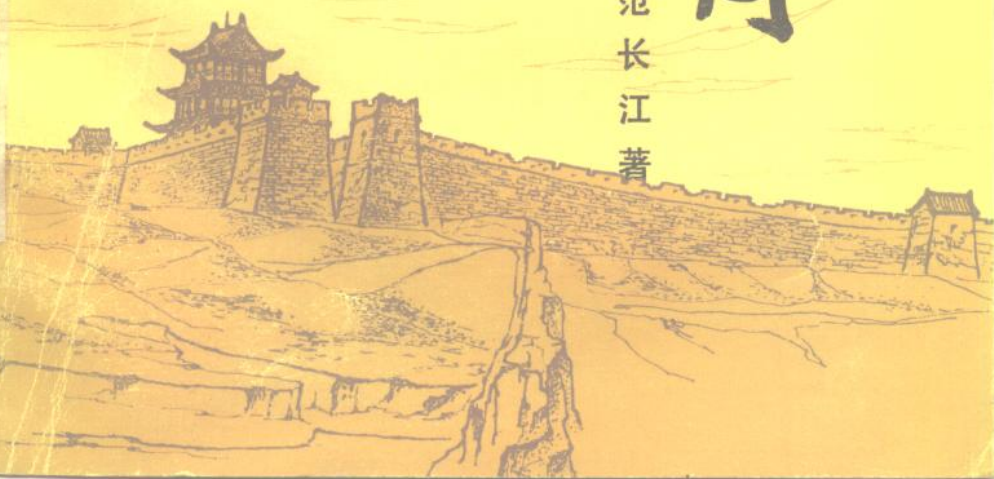


中國的西北角

范长江著



I253/16

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9793



新华出版社

769793

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 著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70,000 字

198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5 月重庆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203·011 定价: 0.90 元



長 江

一九〇九——一九七〇

编 辑 前 言

范长江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是无产阶级新闻战线上的杰出战士。他于一九七〇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为了整理中国新闻事业的史料，为了纪念范长江同志，我们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搜集、整理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部《范长江新闻文集》。这本《中国的西北角》是其中的一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国民党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妄图以连续不断的“围剿”消灭工农红军，使祖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正在读书求学的范长江同志，怀抱着救亡图存、探索真理的志愿，曾经迢迢数千里，从北平到南昌，秘密地阅读和研究关于工农红军和苏区的制度与政策的小册子；也曾经长途跋涉，到抗日前线的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了解当时国民党和地方当局以及军队中政治腐败、士气低落的情况。而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进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年仅二十六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以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西北地区的现状和未来，他走出书斋，离开学校，进行实际考

察。他以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到川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广大西北地区去采访，他的足迹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北至包头，西达敦煌，全程四千里，历时十个月。他将旅途通讯陆续寄到大公报发表。由于他第一次公开如实地报道了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当时神秘西北的黑暗和危机，他的通讯引起了全国的震动。

当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由于国民党对真实情况紧密封锁，范长江同志又冒险只身进入西安，以后又到延安，了解事变真相，并迅速报道出去。他在通讯中，报道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会见他时所作的长时间谈话的内容；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从而使党的声音，光明的信息，公开地传给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长江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去。他到芦沟桥、南口前线，到西北、华中、东南等地战场，奔波不息，辗转万里，写下了许多革命人民前赴后继的可歌可泣的篇章，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的腐朽和无能。从此，范长江的通讯，脍炙人口，中外注目。我们在编辑范长江同志的新闻文集时，除了将过去已经汇编成书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中的文章，加以校订以外，并且广泛搜集了他当时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对新闻工作的意见、讲话、论著、总结等。这些都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宝贵史料。

范长江同志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着强烈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闻记者，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领导者，他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的。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和

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当他一旦接受了革命真理，就勇往直前，为之奋斗终生。他的新闻通讯和其他文章，如同他本人的性格一样，具有鲜明的特点，洋溢着 he 努力追求革命真理、勇于考察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和不畏艰险、果敢坚定的革命风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江同志写作这些通讯和文章，距今已三、四十年了，由于受当时思想认识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也正可以看出他奋斗前进的过程。解放以后，许多同志多次提议长江同志将这些著作重新出版，都被他拒绝了。有的同志曾经建议修改后出版，他也不同意。他说：“修改后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性。错了就错了，不必乔装打扮，借此骗人。”这是多么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高贵品质！

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八年秋天，对参加华北记者团会议的记者，谈到范长江的新闻通讯。他说：长江同志过去在白区当记者，写了很多报道，是全国有名的记者。但他的报道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同志们要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条件下，有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六十真理挤出去也不容易呀！……这是少奇同志对长江同志的正确评价；也是对长江的通讯报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我们在搜集、整理、编辑过程中，承蒙长江同志的夫人沈谱同志和其他家属成员，长江同志生前战友，以及新闻界、出版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深表示谢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三月

序 言

许多在三十年代生活过的朋友们现在还常常向我谈起《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当时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本书在发行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曾连续印刷了七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长江后来在他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讲过，他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感到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两个重大问题。因此他不畏艰险地开始了这次采访旅行。

他的新闻通讯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地区的黑暗、腐朽、愚昧和贫困的现状。对于那里经济的雕敝、民族的压迫、宗教的纠纷、军阀的争夺和日益深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无不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这些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使广大读者深入地思索民族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特别是他第一个公开报道了正在进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他努力用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使读者了解事实真相。

在本书中，长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

想。坚持这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努力追求真理和光明，使他终于从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获得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并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诲，他的政治立场开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长江在世时常常用严格的标准谈论自己当时的作品，认为自己的认识水平很不够，感到自己没能更早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很大的遗憾。如果今天长江还活着，他不会同意本书重版。然而我想，这本书对于研究近代历史和新闻史的同志们或许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对于其他对本书有兴趣的读者也许会有所裨益，所以在新闻界、出版界同志们的敦促之下，我同意将本书重版了。这也是对长江的纪念吧。

对原版本比较明显的文字上的错漏，我作了必要的校正。

本书重版承蒙新闻界、出版界同志和朋友们的大力协助，我在此深致谢意。

沈 谱

一九八〇年三月

第四版自序

本报(指《大公报》——编者)出版部朋友来信告诉记者,本书正赶印第四版。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解放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所以借此出版的机会,提出鄙见,和读者诸君商酌。

察、绥、宁、甘、青、新六省,除新疆而外,其余五省,就目前现状而论,经济价值甚微,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带,肥瘦之差,直不可以道里计。然而日本关东军却以非常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不断由东北以伸向西北,不惜重大的牺牲,在内蒙古草原与沙漠中,作凶猛的经营。东北之后,继以热河;热河之后,继以察北,近更不惜作武装夺取绥远的冒险行动。

日方对外宣传,其所以企图占领西北一线,为“防止赤化之南侵”。换言之,即为“围困苏联”,以救中国于厄运。自表面言之,日本之侵略西北,乃“防共”之手段,而并非目的,似为尚可原谅之动机。最近某地学生救国联合会拟就宣言一篇,其中认识深受此种不真实宣传之影响。认为日本之攻绥,目的在包围外蒙古,进攻苏联。

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

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苏联在亚洲的领土，深深威胁着日本在大陆上进攻中国的大路。故日本欲求安全地进攻中国，不得不对东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加以武装控制，甚至想掠为己有，此其一；其次，日本无已止地进攻中国，势必迫中国以求国际援助，英美受地理条件限制，所能给予中国之助力有限，但万一中国自西北以联合苏联，则军事上立即可起非常变化。故日本必先在陆路上截断中苏联合的纽带，即所谓大陆封锁政策。

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

记者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长 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于绥远

范长江同志小传

东 辑

范长江同志，原名范希天，一九〇九年十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少年时代的家庭是没落地主。他的母亲以个人手工劳动的收入供给他读书。他先后在内江中学和四川省六中上初中和高中，学习期间，成绩优异。由于受到大革命时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当时国民革命的一些宣传工作。

一九二七年年初，他转入吴玉章同志所办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入校不久，重庆发生四川军阀制造的“三·三一”惨案。学校被封，革命学生尸体枕藉街头。他从血腥屠杀中脱身之后，抱定参加革命的决心，离开家乡，乘船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在武汉加入二十军的学生营，随军进入南昌。部队编入贺龙为军长的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学生营在潮州被打散，他在汕头寻找主力部队未果，遂流落于广州、福建、江西、安徽一带，以讨饭为生，后重病几死。为糊口计，他又入军队医院当看护兵。

长江同志当时虽然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但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为了生活和进一步学习，他考入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当时他希望

以著名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精神为模本，走出一条救国救民的路来。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危机愈益加深，国民党的统治日趋反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这一切使他逐步感觉到，他所受的教育绝不能回答他所关心的民族命运和人民前途的大问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中央政校校方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意旨，对此无动于衷。长江同志在一个晚上军训点名以后，站了出来，对数百同学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斥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感动得许多同学放声大哭。此后，他积极担任了学校学生抗日运动的领导工作。但是不久，在校方软硬兼施之下，学生运动却被压制下去了。这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贼的丑恶面目。他决定脱离中央政治学校。利用一个星期日，他换掉制服，秘密潜逃。

一九三一年底，他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北平。为了探求真理，继续学习，他在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工读生活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际进入北大哲学系。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侵占山海关。他强烈地意识到，脱离实际钻故纸堆是无法解救空前的民族危机的。从此，他全力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他曾参加“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的活动，出发到热河省凌源一带。回北平以后，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他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投稿，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新闻。这是他投身新闻事业的开端。一年之后，他成为《大公报》的撰稿人。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抗日军事问题的研究。

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查旅行。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专横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外界民众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他当时注目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他那时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为了向广大读者解答这些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他以惊人的勇气踏上了旅程。这次考查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全程四千余里，历时十个月，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地区。他的旅行游记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游记中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他的报道谈古论今，意趣横生，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其中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以及处处表现出来的正直高尚的民族民主主义精神，获得广大读者的称颂。这些游记以后汇集出版，就是《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内连出七版，一时脍炙人口。

这次旅行结束以后，他回到天津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

一九三六年八月，为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覬覦内蒙西部的实况，他长途跋涉深入额济纳旗，后骑骆驼穿行千里戈壁返抵阿拉善旗。

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战地采访工作，从百灵庙和红格尔图一带抗日前线写出很多通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为了揭示事实真相，澄清社会舆论，以利于促成团结、民主、全面抗战的政治局面，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从宁夏飞抵兰州，又由兰州进入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心西安。在那里他经过杨虎城找到周恩来同志，并作了竟日之谈。二月六日，他在博古和罗瑞卿同志陪同下，驱车前往延安。二月九日夜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与他作了通宵的谈话，讲解了十年内战的经过，并详细地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除美国记者斯诺而外，他是以正式新闻记者名义进入延安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陕北之行》，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以极大的热情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我党的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主张，对全国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这些报道使蒋介石恼羞成怒。长江同志的信件也开始被检查。

他的自西蒙之行以来的通讯后来汇集成册，题名《塞上行》。

在斗争的风浪中，长江同志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救星，他和党的关系密切起来。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他奔赴抗日前线采访新闻。在枪林弹雨之中，写出大量通讯。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与徐迈进、陈同生、恽逸群等同志在汉口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在党的支持、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青记”成为团结抗日的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弃守前夕，他因与《大公报》张季鸾、胡政之之流的政治观点分歧已达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公开

宣布脱离《大公报》。随即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他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同志创办国际新闻社。一九三九年初，在抗日文化中心桂林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

同年五月，长江同志在重庆由周恩来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从此以后，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与敌人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

他参与领导的“国新社”和“青记”的抗日新闻工作，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利用合法地位，与《新华日报》互相配合，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网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国新社”发出的新闻稿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宣传了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长江同志与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同志在重庆结婚。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青记”和“国新社”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蒋介石下令逮捕长江同志。他得到李克农同志通知后，立即撤退到香港。到香港后，即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办我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并兼顾香港“国新社”的工作（当时香港“国新社”是恽逸群同志负责）。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记”和“国新社”随后也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止活动”。一九四一年年底，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长江同志辗转桂林、武汉、上海等地，最后到达苏北解放区。在解放区他担任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抗战胜利以后，一九四六年五月间，他从苏北到南京，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进行谈判时，他是中共代表团对外发言人之一。

解放战争期间，他始终跟随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担任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四大队队长，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全国解放初期，他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一九五二年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一九五四年第一届“人大”以后，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他为创造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派长江同志到科技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参与制订了十二年规划的组织工作，组织和参加了科学界历次重要会议。在主持全国科协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他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成为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卓有成效的领导干部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打击迫害革命老干部，范长江同志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范长江同志在河南确山被迫害致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